

文军, 刘雨航. 面向不确定性: 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应对 [J]. 地理科学, 2022, 42(3): 390-400. [Wen Jun, Liu Yuhang. Facing uncertainty: The dilemma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its respons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3): 390-400.]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3.004

面向不确定性: 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应对

文军^{1,2}, 刘雨航^{1,2}

(1.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0241;
2. 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上海 200241)

摘要: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 所面临的直接风险逐渐向潜在的不确定性转变。研究发现, 发展环境、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增长, 共同推动着不确定性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这对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产生冲击, 使其遭遇价值、行动、方法和结果等层面的多重困境。对此, 需要在树立不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 从主体赋能、机制创新、制度创设等维度入手, 推动“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 以此走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 提升治理效能。

关键词: 新发展阶段; 不确定性; 治理困境; 韧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2)03-0390-11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 正如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变化,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以“不确定性”取代“风险”, 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反复暴发推动着“不确定性”议题的兴起, 不确定性的应对成为当下迫切的现实诉求。实际上, 不确定性与风险高度关联却又不尽相同, 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和首要特征^[1], 风险则是不确定性的一种具体表征^[2]。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 不确定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更是被赋予多重意涵: 一是在本体论层面指代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与变动性(variability)、不稳定性(instability)的概念较为接近^[3], 是所有事物都具备的客观属性和存在状态, 只存在程度区分而不带价值判断。二是在认识论层面指代人们基于自身经验以及各种条件对事物发展状态所做出的一种判断, 是对事

物未知或未完全知晓的状态, 根源于人类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建构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之上, 也因此被赋予人所固有的价值判断, 产生了正向发展与负向发展的方向分化。三是在方法论层面指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范式, 强调研究立场与研究对象的双重不确定性, 主张“动中取动”“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4]。不难看出, 不确定性中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并存, 风险可看作是不确定性所暗含的负向发展可能性的具象化, 体现着对不确定性指向化、客观化的概率判断和“确定性”表达, 是一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

现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长同时体现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 在伴随现代化进程增长的同时, 也在人类的生存空间中蔓延。打破“时间”与“空间”的二元对立, 在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中将“不确定性”议题的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相结合, 成为我们理解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前提条件。

收稿日期: 2021-07-01; **修订日期:** 2021-11-01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1BSH002)资助。[Foundation: Shanghai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2021BSH002).]

作者简介: 文军(1969-), 男, 湖南祁阳人, 教授, 博导, 主要从事城乡关系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 jwen@soci.ecnu.edu.cn

就此而言,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具有同源性,都植根于现代化转型,因此社会学更加擅长于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角度对“不确定性”议题展开历时性分析^[4],提供不确定性产生机制的学理解释。而地理学作为以空间分析为基础的学科,则更加擅长对“不确定性”议题的共时性分析,在对不确定性空间分布特征的判断与测量上有着显著优势^[5]。此外,地理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也成为少数能够同时对自然世界^[6]与社会世界^[7]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展开深入研究的学科。面对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既需要在现代化历程中把握其产生机制,也需要把握其空间分布,推动地理学与社会学就“不确定性”议题展开对话迫在眉睫。尤其是近年来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UGCoP)的提出^[8],在从地理空间变量角度分析个体行为及其差异性的同时^[9],认为这种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还体现在时间维度^[8],这为经验研究层面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分析的结合提供了思路^[10,11]。此外,社会学和地理学的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特征,且都突出对研究对象展开科学取向的分析,这也为两个学科甚至更多学科相互借鉴开展“不确定性”议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社会治理为此提供了实践平台。从可行性看,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将成为新发展阶段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9],同时也是地理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理论议题与实践领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取向有利于在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中推进两大学科知识体系的整合。从必要性看,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同样对社会治理实践造成冲击,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要素都需要进行相应变革。面向不确定性,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是社会学、地理学乃至更多学科的共同使命。基于此,本研究将沿袭这种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以及社会治理的实践导向,从现代化的历时性视角出发,在刻画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不确定性特征整体图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并对其应对之策进行尝试性探讨。希望能够通过社会治理的实践平台,在“不确定性”议题上与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共同助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体制的日趋完善。

1 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

不确定性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便长期存在,其大规模增长却是新近之事。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确定性”结构,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从中释放,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与全球反复,则让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登场,同时体现在发展环境、发展主体以及发展方式等诸多面向上。

1.1 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

工业社会时期,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以社会风险的形式呈现,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直接风险开始向潜在的不确定性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类对自然界的掌控力度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提高,自然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虽然始终无法消弭却也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科学化的文明”中,人们所依据的格言是“凡有存疑,进步优先”,发展的“潜在副作用”被掩盖在生产力的繁荣之下,甚至被当作与此存在关联的正当化模式^[12]。人化(自然)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迅速攀升,“很多危害在今天也成为事实——森林破坏、水体污染以及新型疾病……”^[12]。二是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强调“沟通”^[13]与“信任”^[14]是社会系统应对不确定性的具体方式。但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使得个体习惯于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整体地理解外部世界,行动者对世界的想象与客观事实之间所存在的或然率,使得“主体间的理解之难”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事实^[15]。陌生人之间由于缺乏关于彼此态度、价值观和特征的信息,而不具备建立信任的基础,熟人信任的衰弱是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必然结果^[14]。但新型系统信任尚未健全,这在降低人们不确定性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三是网络环境的不确定性。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当下最显著的变革之一,网络世界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空间场域,这在为中国社会发展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网络世界基于其匿名性、流动性和脱域性特征而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开始向整个社会世界传递和蔓延,甚至直接推动着不确定性成为新阶段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16]。

1.2 发展主体的不确定性

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塑造着现代人的生存状

态,当今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的不确定性程度相较于以往历史时期都要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个体认知的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性的增强以及信息传递的脱域,在冲击传统意义体系的同时,也致使新的意义体系不断产生,不同意义体系间的碰撞不断加剧。这些变化共同导致了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的瓦解,正如彼得·伯格所言,现代性必然导致宗教等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的消退^[17],“相对性意识成了覆盖面宽广的事实^[18]……不确定性主宰了现代人的意识,真理被观点、舆论、怀疑、偏好和时尚所取代^[19]”。个体认知的不确定性程度迅速提升,在促进个体意识觉醒、认知能力提升的同时,也导致自我认知危机频发,深刻影响着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和群体认同^[20]。二是心理情感的不确定性。个体化社会的到来使“人”从确定性的范畴中解放而出^[21],主体能动性得到宣扬,为个体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技术治理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和政策实践的主导逻辑,基本特征是强调风险控制、事本主义原则以及工具主义地动员社会^[22]。这种治理模式对“制度-技术”维度的过度强调难以避免地压制着民众各种心理情感因素的正常释放^[23]。三是日常行为的不确定性。个体认知与心理情感不确定性的增长,赋予了社会民众更多创造力,却也导致个体异常行为甚至是极端行为日益频发^[4]。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个体行为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不确定性行为在发展过程中的“双重后果”日益凸显。四是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随着个体化社会和流动社会的到来,血/亲缘、地缘关系正在从稳定走向松散^[24],业缘关系受到数字经济繁荣、非正式就业兴起等因素的影响更是充满不确定性。线上交往方式的兴起也重塑着传统的社会关系联结方式与存在形式,社会关系在实现脱域的同时变得愈发不确定,难以继续为个体提供确定性的社会基础和可持久的人际交往,不过这也在拓展社会交往空间的同时,使及时沟通成为可能。

1.3 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

新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同样源自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式本身,人们越来越难以驾驭“现代性的猛兽”^[25]。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26]。现代社会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现象不断产生,

传统的真理被不断颠覆,知识的不确定性被打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所有的科学知识乃至人的生存状态都建立在流沙之上^[27]。不确定性成为任何知识都具备的重要属性,既包括主观上认知者个体对知识的不信任、不确定程度;也包括客观上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这与环境的复杂性和未知条件相关。科学知识的快速更新推动着社会发展,人们却又囿于自身认知和实践能力的有限性而时常难以熟稔运用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科学知识^[28]。二是理性化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后果日渐显现。启蒙运动后,理性精神取代了虚幻的上帝主宰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理性化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29]。但理性化所强调的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其核心是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细的科学计算来实现效率或效用的最大化^[30],这种计算不仅所依赖的规则是从历史中所获得的确定性经验,其计算要素也是基于对未来的确定性假设,即假设了特定的行动情境条件。但现代性的断裂正在发生,“传统”日渐失效而“未来”也愈发不可触摸^[25],日益不确定的社会现实冲击着理性化所假设的确定性立场,“理性循环”所维持的“虚假确定”被打破,理性化的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后果浮出水面。三是生产生活方式也愈发具有不确定性。不同于传统社会大多数成员一眼便可望到头的“直线人生”,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液化化和信息化趋势在推动发展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长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社会相对确定的生产生活模式。近年来快速普及的信息网络技术更是重塑着现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呈现出明显的“脱域(disembedding)”特征。个体在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不仅自我的人生际遇充满了更多可能,也共同塑造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态。

除上述表征外,不确定性在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境中还呈现出以下演化趋势:一是不确定性的内在化趋势。传统风险主要存在于外部发展环境之中,不确定性则开始向人类自身转移,建构在“人”及其行为之上的社会世界成为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二是不确定性的全面化趋势。发展环境、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新发展阶段不确定性因素的全面增长。总之,“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宏观叙事和整体特征,同时又真实地

影响着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与走向。可以说, 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正在从所谓的“风险社会”朝着“不确定性社会”(uncertain society)转变, 我们既面临着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境, 也将迎来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更具能动性的发展主体和更加灵活的发展方式。

2 不确定性情境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多重困境

社会秩序作为约束人类行为的重要方式, 自奥古斯特·孔德创设社会学之初便与确定性密切相连^[31], 社会治理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形式, 也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技术治理转型时期, 面对发展环境中激增的社会风险, 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上的刚性制度实现社会发展能力的全面整合, 以有效控制社会风险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伴随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全面增长, “社会秩序诉求-不确定性变化”的张力日益激化, “刚性治理”模式难以维持常态整合, 社会治理实践面临多重困境。

2.1 价值困境: 风险思维仍然主导着治理实践

工业革命在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触发了“风险开关”, “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解放, 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 也就是‘风险社会’”^[12]。风险社会中, 各种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风险接踵而至, 风险防控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确定性的寻求在风险防控中实现。虽然二战后, 全球社会步入秩序重建阶段, 部分直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但风险社会的阴霾久聚不散, 各种新型风险也在不断滋生, “风险思维”仍然主导着社会发展领域中绝大多数理论家和实践者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社会治理作为风险社会的重要建制, 同样带有强烈的“风险防控”取向,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要承担补偿性功能, 即侧重于对发展环境中风险因素及其破坏性后果的防控。风险防控型治理模式的价值追求在于通过制度刚性维持社会整合, 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但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 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根源于“风险社会”和经济转型时期的风险治理模式难以满足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一方面不确定性正在取代风险成为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 不确定性较之风险不仅内蕴着社会发展的

活力因子, 也更加随机化和内在化、全面化。外部防控取向的风险治理模式虽然仍维持着社会稳定和整合, 却愈发难以应对人类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 对社会风险的过度强调也致使其时常忽略、错失甚至压抑不确定性中与风险相伴而来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 新发展阶段更加强调中国社会的协同发展以及“人”的发展, 社会治理在新发展格局中将处于更具主体性的角色定位并承担着重重要的发展性职能。但在风险思维主导下, 尤其是在中国纵向的“层级治理”体系中, 行政压力逐级下沉, 地方政府存在着对上级政策的僵化、过度执行^[32], 而难以在“社会发展”与“风险防控”之间保持弹性平衡, 致使风险防控中“一刀切式”的治理手段时常上演, 严重压制了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和社会活力。

2.2 行动困境: 不确定性的应对具有天然难度

随着不确定性社会的到来, 不确定性的应对成为社会治理的时代使命。但西方风险社会学领域普遍认为风险是可治理的, 而不确定性是不可治理的^[28]。虽然“不确定性不可治理论”的观点在当下看来似乎带有着绝对化的倾向,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 不确定性的应对具有“天然难度”, 这也进一步限制着现阶段社会治理实践的展开。

应对不确定性的天然难度首先根源于其自身属性所导致的具象化和操作化困境。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发展的可能性, 不仅这一概念本身较之风险更加抽象, 在现实世界中更是处于“明暗交替”的不稳定状态, 潜隐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 却又有着随时演化成风险或机遇的可能,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便是其直接证明^[33]。新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全面增长的同时, 还与流动性、个体化、内在化趋势并存^[4], 使得作为治理对象的不确定性更加变化莫测和难以捕捉。如何运用技术、程序以及设备将抽象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预期的行动并加以操作化, 使之成为具体的治理对象, 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首要问题和行动基础。此外, 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面临“双重不确定性”困境, 外部的可预测风险(calculable external risks)正在向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self-generated uncertainties)转变^[34]。这对社会治理而言, 具有双重意涵: 一是不确定性不仅作为治理对象而存在, 同样存在于治理主体之中, 在对不确定性展开治理的同时, 治理主体的不确定性使得治理过程更加复杂多变。二是治理主体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使其自

身成为重要的治理对象。不仅需要“对人”所带有的风险加以防范,同样需打造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能动性的治理机制,这使得不确定性的治理难度进一步提高。简言之,不确定性社会的到来,治理对象与治理主体的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并相互转换,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实际上处于“双重不确定性”之中,使得治理主体在治理实践中身陷“行动困境”。

2.3 方法困境:传统的治理机制难以正常生效

传统的风险思维仍主导着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但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并不会因此停下脚步。不确定性不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唯名式”概括,而是真实作用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成为不可忽视的治理对象。就作为治理对象的不确定性而言,其中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同时呈现出内在化特征。因此,现阶段的社会治理不再是单向度地考虑风险防控问题,而是要在防控风险的同时抓住发展机遇;其治理对象也不仅是外界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同样包括“人”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这比单纯的风险治理更加复杂也更加困难。

不确定性已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对象,但相应的治理机制却尚未建立健全,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遭遇方法困境:一方面,传统的风险治理机制遭受不确定性发展的冲击,无法有效应对不确定性社会中的新型风险。风险在不确定性社会仍将长期存在,但其存在形态将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不确定性风险。这给常态化的风险治理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情境挑战”(contextual challenge):一是风险的突发性导致以往的治理预案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风险持续发展的各种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增加社会治理和防控的风险;三是风险防控的紧迫性要求快速提高风险治理的时效性,避免因拖延而带来的更多风险;四是风险演变的复杂性给风险治理和综合防控带来了许多更严峻的挑战;五是风险后果的危害性增加了风险治理的成本和负担,加重了社会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不确定性的治理机制更是严重缺乏。霎时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引发了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对不确定性议题的高度关注,开始普遍意识到应对不确定性的必要性^[4],但不确定性的实践应对及其治理机制建构则需要一个相对漫长和艰难的探索过程。尤其是新冠疫情背后不确定性因素的涌现具有突发性,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和操作空间极为有限。

不确定性社会已经来临,不确定性的应对迫在眉睫但其具体机制却尚未建成。目前只能是以“老一套”来勉强应对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其后果是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治理效果却难以得到保证。这一弊端在当下新冠疫情这块“试金石”下暴露无遗,全球社会为防控新冠疫情付出了巨大治理成本,但疫情不断反复,发展机遇难以寻觅。

2.4 结果困境: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后果频发

理性化、强调理智,特别是“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35]。理性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武器^[36],祛魅的理性化过程也可看作不断消除不确定性进而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但现代社会的悖论在于对理性的追求反而导致了非理性后果的产生^[35],社会治理作为理性化和寻求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却正在引发大量不确定性后果。

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仍然固守确定性的寻求,但面对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尤其是治理主体不确定性以及制度非预期后果的持续增长,传统的刚性治理只能抓住“制度的稻草”,将其掩盖在制度所建构起的“安全区”之下。事实却是,治理实践中暂时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产生并累积,“二次风险”随时可能发生。寻求确定性的治理机制反而导致不确定性的再生产,对现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产生剧烈冲击:一是阻碍着治理目标与效果的达成。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习惯采取自上而下的分级运作机制,各级政府部门有着相对确定的角色分工,治理目标和效果的达成有赖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行动者之间的有序协作^[32]。社会治理所导致的非预期不确定性后果对确定性的治理过程产生冲击,影响着各主体间有序协作的维持,极易导致治理实践偏离治理目标。二是限制着新的治理实践的展开。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后果同样将成为新的社会事实,使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更加复杂多变,不仅会导致政策滞后等现象频繁发生,也会增加新的治理实践的开展难度。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是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三是导致社会治理的确定性基础日益丧失。社会治理不确定性后果的频发不仅意味着通过制度刚性维持强制整合进而寻求确定性的方式在不确定性社会已不再可行,同样昭示着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确定性基础正在不断丧失,中国社会治理面临本体性危机。

3 面向不确定性: 韧性治理方式的实践建构

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实践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与技术治理转型时期刚性治理(rigid governance)模式对制度确定性的过度强调密切相关。但“韧性正在成为全球治理中广泛使用的习惯表达”^[37], 从最初工程领域的材料韧性, 逐渐向心理韧性、生态韧性和社会韧性演变^[38]。当前亟需将“社会-生态”韧性视角引入治理领域^[39], 去应对社会发展中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40]。韧性治理(resilience governance)作为刚性治理的相对概念, 便是基于这种“社会-生态”韧性视角而提出, 指代一种更具弹性的治理方式, 强调治理的灵活性、适应性、功能连续性以及治理的赋权与预防功能^[41]。不同于刚性治理对制度确定性的过度倚重, 韧性治理更加强调整度手段与治理主体的弹性联结, 通过治理韧性调和“社会秩序诉求-不确定性变化”张力, 在防范“二次风险”的同时, 避免刚性治理模式中, 政策执行中控制权的碎片化以及自下而上社会压力不足等问题^[22]的发生。正因如此, 韧性治理方式更加适应不确定性社会的发展需要, 为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重要思路。新发展阶段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 应当面向不确定性, 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制度等方面共同做出努力(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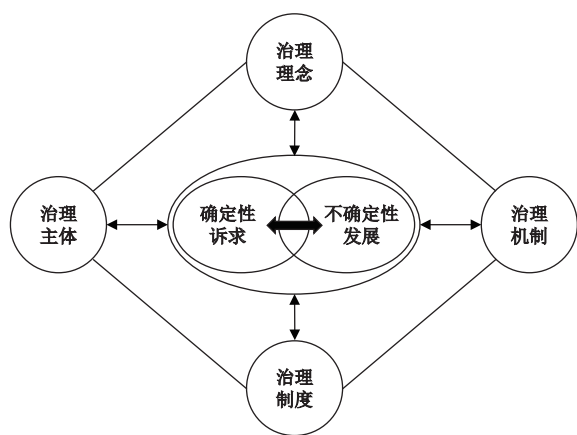


图1 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

Fig.1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3.1 培养不确定性思维, 树立韧性治理理念

新发展阶段所追求的不再是单一的发展速度和以制度刚性为基础的社会整合, 而是在不确定

性的应对中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转型必须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现实基础和整体目标, 重新理解自身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定位, 迫切需要推动传统的风险思维向不确定性思维转变, 树立新型的韧性治理理念, 并以此为价值引领, 再塑社会治理功能, 提高治理效能。新发展阶段韧性治理理念的树立需要把握以下关键: 一是在不确定性发展中重新认识制度确定性。当不确定性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常态, 那么对确定性的追求, 则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天性。在治理范畴中, 制度是确定性的直观体现, 也是寻求确定性的重要方式, 首先需要打破的是组织场域中的“制度神话”, 修正我们对制度确定性的理解认知与应用方式, 通过对制度的韧性运用, 在变动发展的不确定性情境中实现社会整合和发展。二是强化社会治理的预防性、发展性功能。韧性治理方式应当树立“抵御社会风险, 激发社会活力”的行动取向和实践样态, 要在适应性调整补救性功能的同时, 积极培育预防性和发展性功能, 不仅要已发生风险加以防控, 同样要对不确定性中的潜在风险和发展机遇予以应对。三是重视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 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人”正处于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心位置, 在治理实践中需要将“人”的不确定性考量在内, 通过增强治理韧性化解发展主体的内在风险, 并发挥人的能动作用, 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过程回归“人之本真”。

3.2 加强主体赋能, 奠定韧性治理的行动基础

不同于刚性治理的“按部就班”, 韧性治理所强调的动态性建立在治理主体行动能力之上, 因此要从个体、群体和组织层面共同入手, 增强治理主体的行动能力, 让人民群众回归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 推动原来单纯的政府负责, 向“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转变, 推动有限的“一核多方”的共治主体, 向更具凝聚力和包容性的“小政府、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共同体转变^[42]。首先需要靶向人之本身, 加强个体赋能, 提高发展主体在“被围困的不确定性”当中生存的各类技巧^[21]。尤为重要, 个体的心理情感因素正在成为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来源^[9], 也将成为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面向^[43]。新发展阶段的个体赋能要对心理情感维度予以关注, 通过心理建设

增强发展主体的心理韧性和抗逆力,进而提高发展主体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和治理参与能力。但流动时代,应对不确定性的根本困境在于“社会系统矛盾的个人传记式解决”^[44]。社会治理的主体虽然越来越多元,但主体间的联结和互动性却在不断削弱,各种社会排斥和集体自私现象普遍发生,治理效能严重受限。在充斥着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建设对个体而言反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是实现主体联结和增强个体安全感的重要方式。例如,积极参与构建“社区共同体”“职业共同体”和“社群共同体”等外在取向的实体性共同体,以及“情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等带有内在取向的价值性共同体就是主体赋能的重要方式^[45]。新发展阶段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要在加强个体赋能的同时打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共同体建设增强发展主体间的群体韧性,提高集体行动能力,以此奠定韧性治理的行动基础。

3.3 创新治理机制,打造“模块化”治理方式

伴随着不确定性的“跨边界”甚至是“去边界”生长,应对不确定性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对社会治理提出了系统性、科学性、动态性等方面的新要求^[46]。对此,韧性治理需要超越刚性治理时期部门化的管理思维和风险治理的局限性,以应急管理系统为依托或借鉴,成立系统性的发展协调中心,形成“模块化”的治理方式。简言之,“模块化”的治理方式不是将问题拆分为若干独立个体逐一解决,而是在保持问题整体性的同时着手处理各部分,这能够将刚性治理模式所切割成的“碎片化”任务重新整合为具有韧性的治理有机体,以此避免“一刀切式”的治理手段,动态识别和灵活应对发展的“风险”与“机遇”。“模块化”治理方式基于对不确定性系统性的认识、把握与响应能力,这则需要直面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建立健全不确定性应对机制。“不确定性思维”可以为此提供方向指引:一是遵循主体导向,健全主体行动机制。“人”仍始终是承受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行动主体,需要建立健全主体行动机制,为治理主体提供应对不确定性的行动指南和具体参照。二是遵循关系导向,打造网络响应机制。事物的不确定性总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是可以确定的,需要打造一套网络响应机制,通过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把握不确定性的相对位置。

三是遵循结果导向,构建分析预测机制。事物当前的存在状态是相对稳定的,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需要通过分析预测机制的构建,从事物当前的存在状态出发,挖掘其背后已发生的变化历程,并以此为线索探求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4]。还需注意的是,信息技术既是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也提供了模块化治理的技术基础。新发展阶段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需要结合变动的社会发展事实,善用各类新型治理工具,不断创新自身治理形式。

3.4 加强制度创设,推动治理形态的深层变革

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不仅要的发展主体和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予以回应,也需要认识到社会治理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发展方式其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只有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并且深入剖析其存在和发生的内在机理,建立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16],才能有效应对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制度规范作为社会治理的内核,新发展阶段韧性治理方式最为深层的建构路径是要通过制度创设增强治理韧性,进而推动治理形态的深层变革。一方面要从制度对象层面入手,提高制度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兼容性。那种具有确定性的、一成不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我们又无法逃避。因此,新发展阶段的制度创设应当以一种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观点看待、接纳并积极应对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要从制度设置层面入手,增强制度本身的韧性。制度与人的能动性之间并非完全不兼容^[47]，“人”既是制度规范的客体,也是制度规范的建构者、执行者和更新者,在制度执行、反馈、创新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作用。韧性治理制度的创设不仅要治理对象层面的不确定性考量在内,同样需要创新制度设置,在制度框架内为治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保留韧性空间,要在减缓制度压力的同时,建立健全更具灵活性和及时性的制度反馈和调节机制,以使社会治理实践能够在应对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实现动态调整。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设增强治理韧性,以此调和社会治理所内含的“社会秩序诉求-不确定性变化”张力,努力化解社会治理自身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或者学会与之共处。

本文试图在“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张力中,对“韧性治理”加以讨论。实际上,刚性治理与韧性治理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划分,刚性治理与确定

性之间、韧性治理与不确定性之间也并非简单对应。纯粹的刚性治理和韧性治理都具有韦伯式的“理想类型”色彩, 是社会治理实践谱系的两个端点, 分表代表我们对制度确定性的依赖和对人之能动性的倚重。真实世界中社会治理实践只会游走在两个端点之间, 其中的韧性空间无法消泯, 对制度刚性的运用和确定性的追求也始终存在。现阶段对韧性治理方式的强调, 所指向的是打破对制度刚性的迷恋以及呼唤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复归, 以应对社会发展中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

4 总结与讨论

本文旨在从不确定性视角出发, 探究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转型困境及其应对问题, 主要结论如下: ① 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宏观叙事和一种整体特征, 并真实地影响着全球社会的发展过程与走向, “风险社会”正在向“不确定性社会”转变。② 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全面增长的同时, 传统风险防控取向的刚性治理模式日益难以为继, 在价值、行动、方法和结果等维度面临多重困境, 必须树立“不确定性”思维, 实现从“风险治理”到“不确定性应对”的转变。③ 新发展阶段, 亟需面向不确定性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体制转型, 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则为此提供了实践方向。

具体而言, 韧性治理所追求的不再是确定的、统一的治理模式, 而是旨在调和主体能动性与制度刚性之间的张力, 这也恰恰使得韧性治理方式处于持续的更新和建构之中, 能够在不确定性情境中实现动态的功能优化与结构调整^[46]。我们应对不确定性发展的目的并非要预测和规划某个事件或行动是否如期发生, 韧性治理所追求的不再是“确定性的结果”, 而是旨在为发展主体提供将行为调整到符合自身发展轨道上来的行动指南^[48]。这使得韧性治理在不确定性的应对上具有天然优势, 但其实践模式的建构仍有待深入, 如何从“刚性治理”向“韧性治理”模式转变, 正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此外, 本文还具有如下理论意义:

一是为社会学和地理学以及更多学科之间, 就“不确定性”议题跨学科对话的开展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不确定性的学术谱系中仍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张力。不确定性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

方位的, 关涉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但现有的知识体系习惯于通过各种学科边界的建构来划定各自的学科领域, 将人类世界切割成一块块独立的研究领域, 在推动各类“专家知识系统”日益精深的同时, 也造成了科学知识体系的碎片化和微观化。不同学科在不确定性的探究上各有优势, 却难以达成对不确定性的整合分析和有效应对。对此, 本研究旨在将不确定性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提出, 在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境中探究其本体属性。这为“不确定性”研究中社会学擅长的历时性分析和地理学擅长的共时性分析提供了结合点, 也为“跨学科”整合分析甚至“一体化的学科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的开展提供了着力点。例如, 城乡关系作为社会学和地理学共同关注点, 随着城乡流动性的增加, 其内含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与日俱增, 在此议题上, 社会学能够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 提出包含结构视角、能动视角等在内的解释框架, 而地理学则能够在空间上把握乡城流动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分布特征并进行有效监测, 这为实践层面实现从“地域性治理”到“流动性治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49]。

二是将“不确定性”议题与社会治理相结合, 在为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研究提供新视角的同时, 提供了不确定性研究的实践平台。不确定性成为社会治理研究和实践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例如, 城市治理、农村治理以及城乡治理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伴随着个体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剧烈转型变迁, 其共性是正在由一个相对“确定性”的路径走向“不确定性”, 这种转型时代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城乡的生产、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已经成为基本现实, 城乡流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为显著^[50]。新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治理”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紧密交织, 不确定性已然成为社会治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面向, 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需要进行多学科、多主体、多部门的协同工作^[51], 这也为不确定性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跨学科的实践平台。循此, 治理者需要树立不确定性意识, 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真问题”“真需求”为导向, 搭建跨学科的交流和实践平台; 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需要加强现实关怀, 在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境中推进理论创设, 弥合“不确定性”研究知识体系的内部张力, 并加以整合运用。

如今不断呈现的“不确定性”现象似乎已超出人们搭建的“可能性隧道”(tunnel of possibilities),取而代之的是在“主体行动的无序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发展要素的联动性”共同作用下的“复合叙事”^[52]。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发展主体的不确定、发展方式的不确定性等各种不同类型、领域、层次的不确定性一起共同演绎出了“不确定性”的复合表征。因此,当前更需以不确定性为理论导向、以社会治理为实践平台,采取“跨学科”或“一体化的学科方法”来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对此,我们期待通过这篇文章的抛砖引玉,能够激发更多的学者从跨学科角度来思考“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议题,为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提供更切实际且富有前瞻性的思路与方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Jansen T, Claassen L, Kamp I V et 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uncertain risk'. A qualitative study among different societal groups[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9(1): 1-14.
- [2] Aven T, Renn O. On risk defined as an event where the outcome is uncertain[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09, 12(1-2): 1-11.
- [3] Walker W E, Harremo S P, Rotmans J et al. Defining uncertainty: A conceptual basis for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n model-based decision support[J]. *Integrated Assessment*, 2003, 4(1): 5-17.
- [4] 文军, 刘雨航. 不确定性: 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兼及构建“不确定性社会学”的初步思考[J]. *天津社会科学*, 2021(6): 73-83. [Wen Jun, Liu Yuhang. A sociological review of 'uncertainty': An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ng sociology of uncertainty.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21(6): 73-83.]
- [5] 陶旻, 汤国安, 王春, 等. DEM地形信息量计算的不确定性研究[J]. *地理科学*, 2010, 30(3): 398-402. [Tao Yang, Tang Guoan, Wang Chun et al. Uncertainty of terrain information content based on grid DE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30(3): 398-402.]
- [6] 奚旭, 张新长, 孙才志, 等.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下辽河平原地下水脆弱性评价及空间分布软区划[J]. *地理科学*, 2017, 37(9): 1439-1448. [Xi Xu, Zhang Xinchang, Sun Caizhi et al. Assessment and soft zoning of groundwater vulnerability in the lower reach of the Liaohe River Plain under uncertainty condi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9): 1439-1448.]
- [7] 陈诚.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乡村政策演变与乡村地方重组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63-571. [Chen Cheng.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state rural policy evolution, rural locality reconstitution and its uncertainty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63-571.]
- [8] Kwan M P. 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102(5): 958-968.
- [9] 谭一泓, 柴彦威, 关美宝. 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对时空行为模式分析的影响——基于西宁市的实证研究[J]. *地理学报*, 2017, 72(4): 657-670. [Tan Yiming, Chai Yanwei, Kwan Mei-Po. The impact of 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on the space-time behavior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Xining,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657-670.]
- [10] Wiehe S E, Hoch S C, Liu G C et al. Adolescent travel patterns: Pilot data indicating distance from home varies by time of day and day of week[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8, 42(4): 418-420.
- [11] 周新刚, 乐阳, 叶嘉安, 等. 动态数据空间分析的不确定性问题: 以城市中心识别为例[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14, 32(6): 701-705. [Zhou Xingang, Yue Yang, Yeh Anthony Gar On et al. Uncertainty in spatial analysis of dynamic data: Identifying city center.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14, 32(6): 701-705.]
- [12] 乌尔希里·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2, 24-25.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Zhang Wenjie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20: 24-25.]
- [13] Jürgen Habermas, Niklas Luh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J].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 305-306.
- [14] 尼古拉斯·卢曼.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 瞿铁鹏,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0-40. [Niklas Luhmann. *Trust. A mechanism for the reduction of social complexity*. Translated by Qu Tiep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30-40.]
- [15] Schutz A. *Collected papers II: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4: 120, 193.
- [16] 刘少杰. 不确定条件下社会信任的分化与协调[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4): 61-68+242-243. [Liu Shaojie. Differen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social trust under uncertain conditions.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20(4): 61-68+242-243.]
- [17] Berger P L.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J]. New York: Anchor, 1990: 25-27.
- [18] 彼得·伯格. 与社会学同游: 人文主义的视角[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56. [Berger P L.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He Daoku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56.]
- [19] Brague R. *The Kingdom of man: Genesis and failure of the modern project*[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8.
- [20] 吴莹. 全球危机中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极端群体认同的形成[J]. *社会学评论*, 2021, 9(2): 157-172. [Wu Ying. How uncertainty impacts on the identity of extreme groups in the global crisis. *Sociological Review*, 2021, 9(2): 157-172.]
- [21] 齐格蒙特·鲍曼. 个体化社会[M]. 范祥涛,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23-43, 49, 181-182. [Bauman Zygmunt. *Individual society*. Translated by Fan Xiangtao. Shanghai: Shanghai Sanli-

- an Bookstore, 2002: 23-43, 49, 181-182.]
- [22] 黄晓春, 嵇欣. 技术治理的极限及其超越[J]. 社会科学, 2016(11): 72-79. [Huang Xiaochun, Ji Xin. Limits to micro-management and logic of the reform.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6(11): 72-79.]
- [23] 何雪松. 情感治理: 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 探索与争鸣, 2016(11): 40-42. [He Xuesong. Emotional governance: An important governance dimens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6(11): 40-42.]
- [24]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化[M]. 欧阳景根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5, 6, 12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Ouyang Jingg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8: 5, 6, 12.]
- [2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20: 4-5, 133.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Tian He. Shanghai: Yilin Press, 2020: 4, 5, 133.]
- [26] Marcuse H.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41, 50, 52, 62.
- [27] Popper K.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J]. London: Routledge, 1962: 4.
- [28] Hansson S O. Uncertainties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0, 54(171): 39-46.
- [29]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30] 张明军. 工具理性与自由政治浪漫主义形态[J]. 学术月刊, 2021, 53(12): 85-95. [Zhang Mingju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form of liberal political romanticism. *Academic Monthly*, 2021, 53(12): 85-95.]
- [31] Comte A.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vol. 4[M]. London: G. Bell, 1896: 218-222.
- [32] 折晓叶, 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4): 126-148+223. [Zhe Xiaoye, Chen Yingying. The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hierarchical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system—A sociological case study of projects entering the villag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4): 126-148+223.]
- [33] 文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73(3): 5-14. [Wen Jun.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commun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ology.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20, 73(3): 5-14.]
- [34] Ulrich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1.
- [35]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M]. California,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 [36] Rodney M. Medical innovation: A diffusion stud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8, 73(4): 520-521.
- [37] Walker J, Cooper M. Genealogies of resilience: From systems ecology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adaptation[J]. *Security Dialogue*, 2011(42): 143-160.
- [38] 李红波. 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启示[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56-562. [Li Hongbo. Rural settlement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theor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56-562.]
- [39] 刘志敏, 叶超. 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95-103. [Liu Zhimin, Ye Chao. A logical framework of rural-urban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95-103.]
- [40] Chelleri L, Waters J J, Olazabal M et al. Resilience trade-offs: Addressing multiple scales and temporal aspects of urban resilience[J].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2015, 27(1): 181-198.
- [41] Welsh M. Resilience and responsibility: Governing uncertainty in a complex world[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4, 180(1): 15-26.
- [42] 王名, 蔡志鸿, 王春婷. 社会共治: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12): 16-19. [Wang Ming, Cai Zhihong, Wang Chunting. Social co-governance: The explore praxis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of multi-subject governanc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12): 16-19.]
- [43] 文军, 高艺多. 社区情感治理: 何以可能, 何以可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28-36. [Wen Jun, Gao Yiduo. The possibility, path and prospect of community emo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6): 28-36.]
- [44] Zygmunt B. *Liquid modernity*[M]. Cambridge: Polity, 2000.
- [45]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 欧阳景根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Zygmunt B.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Translated by Fan Ouyang Jingge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46] 朱正威. 中国应急管理70年: 从防灾减灾到韧性治理[J]. 国家治理, 2019(36): 18-23. [Zhu Zhengwei. 70 year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China: From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to resilient governance. *Governance*, 2019(36): 18-23.]
- [47] Zucker L G.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M]. Cambridge: Ballinger Pub. Co., 1988.
- [48] 文军. 从“结构导向”到“关系为本”: 重构面向不确定性时代的全球化理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1-15. [Wen Jun. From “structural orientation” to “relationship-based”: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ization theory facing the era of uncertainty.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5): 1-15.]
- [49] 吴越菲. 迈向流动性治理: 新地域空间的理论重构及其行动策略[J]. 学术月刊, 2019(2): 86-95. [Wu Yuefei. Towards mobility governanc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new regional space and its action strategies. *Academic monthly*, 2019(2): 86-95.]
- [50] 文军, 刘雨婷. 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 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及其反思[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1(6): 92-106. [Wen Jun, Liu Yuting. Uncertainty of new employment form:

- Digital labor in platform capital space and the reflection on it.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2021(6): 92-106.]
- [51] 叶超, 于洁, 张清源, 等. 从治理到城乡治理: 国际前沿、发展态势与中国路径[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15-27. [Ye Chao, Yu Jie, Zhang Qingyuan et al. From governance to rural-urban co-governance: Research frontiers, trends, and the Chinese path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5-27.]
- [52] 文军, 王云龙. 新发展社会学理论建构中的不确定性发展逻辑及其启示[J]. 社会发展研究, 2022, 9(1): 81-97. [Wen Jun, Wang Yunlong. The uncertain development logic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new development sociology and its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22, 9(1): 81-97.]

Facing Uncertainty: The Dilemma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Its Response

Wen Jun^{1,2}, Liu Yuhang^{1,2}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Research Base of 'Research on Transitional Soci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in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and march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he direct risks it faces are gradually turning to potential uncertainty. It is found that the uncertainty factors of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subject and development mode are simultaneously increasing, which jointly promote the uncertainty to become an overal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resulting in suffering from multiple dilemmas at the levels of value, action, method and result. At the value level, risk thinking still dominates governance practice. At the level of action, it is naturall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uncertainty. At the method level,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difficult to normally take effect. At the result level, uncertain consequences of social governance occur frequently.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ubject empowerm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system creation based on a new uncertainty thinking. What need to be done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ance, resilience governance would be helpful as it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coping with uncertainties. More specifically, what should be done, first of all, is to cultivate the uncertainty thinking and vitalize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In the second, it is supposed to strengthen the empowerment of the subject and build the basis for action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Thirdly, innova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building a 'modular' governance approach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finally, strengthe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deep change of governance form are necessary.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model needs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ubject and multi-sector cooperation. Meanwhile, uncertainty also requires an integrated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At present, it is urgent to take uncertainty a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social governance as the practical platform, and adopt an 'integrated 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refore, w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will inspire more scholars to think about 'uncertain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more practical and forward-looking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at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uncertainty; governance dilemma; resilient governance